

You Can Get There from Here
Shirley MacLaine

你能够從這裏 到達那裏

(美國) 莎莉·麥蓮著

黃文湘譯·香港南粵出版社出版

1975 15



你能夠從這裏到達那裏

You Can Get There From Here

(美國) 莎莉·麥蓮著

黃文湘譯・香港南粵出版社出版

你能够從這裏到達那裏

(美國) 莎莉·麥蓮著 黃文湘譯

出版：南 粵 出版 社

香港北角馬寶道六十六號二樓

印刷：大千印刷公司

香港英皇道芬尼街二號D

一九七六年三月初版。定價港幣三元五角

出版說明

本書節譯自美國著名女電影演員莎莉·麥蓮的著作《你能够從這裏到達那裏》（英文原名爲《You Can Get There From Here》）。原書共分爲二十四章。除頭尾兩章爲引言與結語外，其餘二十二章大致包括作者三大片段的生活體驗。第一大片段敘述作者的藝術生涯，描寫她拍攝一部電視影集的過程，第二大片段是作者參加美國參議員麥戈文競選總統的前後經歷，第三大片段是本書的高潮，主要交代她到中國旅行訪問的經驗。我們在此翻譯出版的，就是這第三大片段部份。

本書作者對於在中國發生的各種事物，有不少新鮮的感受。但由於她本身是外國人，也是首次訪問中國，對一些問題的看法，可能未必恰當，希望讀者閱讀本書時能加以留意。

我從幼年時代起，就夢見中國。它過去在地圖上，在地理書中，是一個不可思議的，廣大無邊的空間，或者是一個如果你在後院裏挖得够深，就可以接觸到的地方。它過去是一個神秘的，一個不可以到達的遙遠境地的象徵，是一個只有少數特權的人才旅行過的地方。然後，在我十多歲的時候，報紙上突然充滿了關於中國的消息。這時，我的父母會和我談起我們怎樣把中國「失去」給共產黨的事。我會問他們，中國在甚麼時候成為我們的，以致產生我們「失去」它的事來。他們對我說，事情太複雜了，不容易解釋。

後來，我長大了，投身於演戲事業中。我在《時代》雜誌上讀到一些恐怖故事，內容講在一個叫紅色中國的帶上面罩的地方，人類被縮小到螞蟻一樣。那時，有人對我說，真正的中國是一個叫福摩薩（譯者按：這是過去外國人對台灣的一種叫法）的地方。當我在地圖上加以研究的時侯，在我看來，這個地方像一個離開海岸的島。當時，許多人說，紅色的中國人一定會在某一

晚上在太平洋岸登陸，征服所有的美國超級市場，侵入私人住所，等等。

我在一九五三年，讀了詹姆斯·藍西·烏爾曼所寫一本叫《卡拉哥羅姆的沙漠》的書。它講一對西方人夫婦，在探求人生的真理和目的時，在中國的內陸腹地消失了，一個朋友接着前往，掉進那沙漠空間的茫無涯際的空虛裏和嗚咽的風聲中。但是，不知道甚麼緣故，這本書却使我覺得，在中國，我能够更加接近自己。後來，我打算站在九龍橋上，遙看對面青翠的山丘，試圖想像中國是怎麼的樣子。

一次，我在高聳的喜馬拉雅山上看出日出，心中突然產生一種衝動，我要躍過金城章嘉峯（譯者註：原文是 Mount Kangchenjunga），在另一邊進入中國。我曾經有許多次，想在香港弄一張偽造護照，有一次實際上已經作了這樣的安排，但是這件事我半途而廢，因為我害怕我會因此失去我的真護照。作為一種代替辦法，我通過書籍到中國去，和埃德加·斯諾、賽珍珠、費利克斯·格林、羅斯·特里爾，尤其是和我的朋友韓素音一起，在中國旅行。

我越來越想瞭解實際情況。我要求像我觀察日本、非洲、印度和歐洲所有國家那樣觀察中國。我要求了解中國的革命。我要親自觀察一個八億人口的國家，在過去二十年裏發生了甚麼變化。我在報紙上，一直注意中國文化大革命的進展。我聽日本新聞記者談話。他們告訴我，中國真正發生了新的變化。他們讚美說，這新的變化是，中國是現代世界上第一個進行真正的人類革命的國家。我要親自觀察這個新的變化。於是，在一九七二年，中國向我打開了門。

一九七一年十月，中華人民共和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到達紐約。當時，伊朗的雅絲拉芙·巴列維公主邀請我去參加一個招待他們的午宴會。最小限度來說，伊朗王的政治，並不是毛澤東的政治。在這個午宴會上，我們談政治問題不多。三個鐘頭裏，我們談論人類問題，他們改變和增長的能力，他們的個人發展，以及中國如何解決這些問題。然後，在午宴會結束之前，我被邀請前往中國訪問。

發出邀請的人，是外交部長喬冠華。他通過一名翻譯人員說（雖然他能說圓滿的英語）：「對美國人民來說，瞭解中國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我們需要改進的東西很多。要別人在一段短時間中理解我們正在嘗試做的事情，是不可能的，因為我們已經進行了四十年的革命才達到目前的境地，我們自己一面幹一面加深自己的認識。我們希望你們美國人民，像我們自己一樣有耐心。」

他像許多亞洲人一樣，拿香烟的手勢很優美。他抽的是中國出產的「熊貓」牌香烟。他交叉着雙腿，小心地平衡他放在膝頭上的一小杯咖啡。他說：「男女演員和著作家，因為表達人民的要求，具有影響人民羣衆和輿論的能力。同時，他們爲人民羣衆所喜愛。我想，你到中國來訪問，會是一個好主意。」

這個邀請的期限獲得了延長，人數也終於擴大。我將率領第一個美國婦女代表團到中國去。我可以帶一個由十二人組成的團體去，成員中包括一個拍攝紀錄片的攝影組。唯一的規定是，全

體成員是「普通」婦女。「普通」是難以解釋的字眼，但我懷着越來越興奮的心情，着手組織一個「普通」婦女的集體。中國人不希望這個代表團的成員是有名氣的人，我自己則例外，他們不要求一羣馬克思主義者，一羣醫生，或一羣激進分子。他們要求的是一羣「普通」婦女。接着，在以後的幾個月裏，我邀請了下列的婦女。

尤妮達·布萊克威爾，一位體重二百磅，住在密西西比州伊沙昆納縣，心胸廣闊的黑人。我在一九六〇年代的一次投票人登記運動中認識她。她那時住在一座沒有自來水，屋頂用鐵皮做成，屋內沒有廁所的屋子裏，汽車路停放着一輛殘舊的「道濟」牌汽車，客廳裏放着一座電視機。由於我在她的屋子裏逗留過，當地的三K分子曾經在她屋子前的草地上焚燒十字架。但是，尤妮達在這種事情發生之後，看來更成長了。在我邀請她到中國去，以及她從震盪中恢復過來之後，她對我說，她的社會生活已經發生了劇烈的變化，她現在被邀請到白人的家中去，因為在此之前，沒有人能够相信，尤妮達·布萊克威爾竟然會到中國去。

芭特麗茜亞·白蘭遜，三十三歲，是一個在德克薩斯州波特阿瑟市德士古石油公司工作的職員。她過去是一個堅強的工會會員，又是一個保守的民主黨黨員。我第一次和她見面的時候，她相信喬治·華萊士將是美國的救星。芭特當時是一個賣弄風騷的女人，平日衣着迷人，把一頭烏黑的頭髮梳成像一個蜂巢，臉上一層層小心塗抹的脂粉。她有強烈的幽默感，經常開自己的玩笑。她的整潔的屋子，座落在波打阿瑟市中下層人家住宅區，裏面有一座立體聲擴音器，許多刻成佛像

形狀的蠟燭，以及裝滿小傢具的架子。她討厭喬治·麥戈文，認為民主黨競選大會是一件丟臉的事（因為發生了「墮胎、柴把及墨西哥人」事件），相信亨利·基辛格和理查德·尼克松是共產黨人。我立刻就喜歡她。當我要求她到中國去旅行的時候，她知道此行是否為美國政府所同意。它當然同意，在那個時候，美國政府中的掌權人是她心目中的「共產黨人」尼克松和基辛格呢。

羅莎·馬蓮，一位聰明成熟的五十歲作家及社會學家。她住在聖胡安市的波多黎各大學裏。朋友們推薦她是一個卓越的研究者。羅莎說話溫柔，性格內向。她為波多黎各人民艱苦工作，並且要求向中國人學習。她說：「任何關於人類的東西，我都有興趣。」

妮妮芭·克羅福特，一個黃褐色皮膚的老瓦荷族印第安美人兒，兩隻眼睛像兩顆潤濕的、烏黑的橄欖，當時在阿利桑那州一處保留地的印第安人事務局工作。她那時大約三十三歲，和兩個離婚後由她管教的孩子，住在一輛拖車裏。她崇拜大自然。一次，她在積雪很深的路上駕駛汽車，和我一同去會見她的住在印第安人傳統的泥蓋木屋裏的父母。她在路上用痛苦的語調，談論白種人對待美國印第安人的骯髒史。她為有機會前往中國旅行這件事高興。她說：「在那裏，甚至大自然也會比我們這裏美麗。」

嘉蓮·鮑妮莉婭，一個十二歲的女學生，住在威斯康辛州拉西尼市。我在麥戈文競選運動中認識她的時候，她正在聯合農業工人聯合會工作，擔任一個對葡萄園主採取杯葛行動的組織者。她頭腦冷靜，在電話裏說話有外交辭令，看來是此行的理想人選。在被邀請直至出發的幾個月時

間內，她着手領取她的第一張護照，要我把這次到中國旅行的事向她的父母進行解釋，並且安排向她學校的校長請假的事宜。

菲莉絲·克朗豪辛，是一位心理學家，有修養的人類學家，以及我的一位親愛的老朋友。當時，菲莉絲四十歲。她在明那蘇達州的一個農場裏長大，對人類自由的廣泛問題有研究興趣，很想觀察中國人民在人與人之間的表現怎樣。她對中國的男女性慾問題，尤其有興趣。她和她的丈夫伊伯哈德·克朗豪辛醫生，寫過許多本關於情慾藝術、性慾幻想、春宮畫與法律，以及婚姻問題的書。菲莉絲實質上是一個和藹可親、關心別人的人，又是一個有才氣縱橫的頭腦的人。但是，在提問題的時候，她却會變為一個辭鋒銳利、態度固執的人。我認為，倘若代表團的其他成員中有人發生精神震盪，她也是一個派得上用場的人。團員中許多人，過去從未離開過她們所居住的城市。

瑪嘉烈·韋特曼。她是最後一個但並不是最不重要的人選。在選擇代表團成員的進程快要結束的時候，我作出了決定，我需要一個保守的，身為共和黨人的家庭主婦，一個富裕的，喜歡體育、旗幟、資本主義和戰俘的人。在我認識的人中，沒有一個這樣的人。於是，我開始到處詢問。瑪嘉烈，像帶着獵狗打獵一樣，從長島走進我在紐約的寓所來。她堅定地說：「你要帶我和你同行。我的名字叫韋特曼，我正是你要找尋的人。我保守、自足，年紀超過三十歲。」我喜歡她。說到底，她堅持我和她同行。

代表團的其他成員，由拍片人員組成。由於我率領的是一個婦女代表團，因此我要一個全女班的電影拍攝小組。我過去看過克羅迪婭·韋爾的優秀紀錄片《三十四歲的喬伊絲》，知道她當過桑德拉·霍治曼在民主黨全國大會中攝製的一部叫《婦女之年》影片的攝影師。克羅迪婭年青、強壯、健康。她習慣於帶着一部三十五磅重攝影機到處走動，能夠負擔起我們在中國的繁重的攝影任務。我要求攝影人員在白天拍攝中國，而在夜間拍攝婦女們對中國的反應。克羅迪婭想到她自己是一個女性，讀過威廉·韓丁所寫的，關於革命對一個中國村莊的影響的經典著作《翻身》，她對於此行表示非常高興。

要求參加我們的四人攝影小組到中國去的年青女人，有幾十位之多。克羅迪婭和我，在幾個星期裏，逐一與她們會見。在會見的時候，所有關於攝影技術上的問題，由克羅迪婭發問，我自己則問個人方面的問題。

各人會見完畢，我們挑選了：南茜·施蕾芭，二十四歲，是紐約最好的電氣技術人員之一，又是一位心理學碩士；卡貝兒·格力克勒，三十歲，是紐約市錄音工人工會獨一無二的女會員，當時受僱於美國「全國廣播公司」，對於考察事物、東方景物和瑜伽，都有濃厚興趣；鍾·韋曼，一個又高又瘦的女人，二十二歲，她是我們的攝影小組成員年紀最小的一個，使用一部伊克萊爾攝影機。分工下來，克羅迪婭負責第一部攝影機，鍾負責第二部攝影機，南茜負責燈光及各種電氣問題，卡貝兒負責錄音。

攝影小組的每一個成員，都是女權擴張主義者，但是，她們又都是個人主義者，各人有自己的獨特性格，各人有自己關心的事情。四員女將當中，克羅迪妮爲人敏感，自覺性強，對於自己「太猶太化」的外表，流露出過多的憂慮。南茜工作的時候，穿的是用藍色斜紋布做成的工作服裝，很用心聽別人講話，說話短而快，像開機關槍。卡貝兒時常歡笑，像一位音樂喜劇明星。她掛慮她在「全國廣播公司」的工作。她向我轉達了這家公司的要求，要我解釋到中國去的目的，是不是已經獲得了美國政府的批准，以及我們將在中國做一些甚麼事。我們甚麼都沒有告訴他們。鍾是一個精神旺盛、鬥志昂揚的女權擴張主義者。她的身體雖然瘦，却顯得非常結實有力，彷彿是她有意讓自己煉成這樣的體格。

我們逐步地加深了對彼此的了解。然後，在一九七三年四月十六日，我們離開了紐約。

我們到達洛杉磯國際機場時，早有成羣新聞記者在那裏等候我們，攝影機對着我們，閃光燈像火網般向我們掃射，問題像潮水般向我們湧來。「我不停地捏着自己，」嘉蓮說：「來證明眼前發生的事是真實的，而不是在做夢。」羅莎說：「要通情達理，就要學習。我兩者都要。」芭特·白蘭遜眨着眼睛對記者們說：「嗨！我認爲，你們民主黨人那樣對待喬治·華萊士，簡直是卑鄙。我要到中國去，會見石油巨頭。我的家在德克薩斯州。我在那裏的德士古公司的工廠裏工作。我希望，他們不在我請假期間扣薪。」

在我聽來，芭特真的這麼說嗎？她真的說，要在中國會見石油「巨頭」嗎？一點不錯，她是

這樣說的。

「很久以來，我就被人指爲共產黨員，」尤妮達說：「因此，我想到中國去，看看共產黨員是甚麼樣子。」

克羅迪婭和攝影小組的其他人員，把五部攝影機和裝配燈、電綫、金屬製攝影機箱子和電燈插頭等攝影器材，搬到環球航空公司那架將載我們飛過太平洋的噴射機上。她們身上全副工作服裝，像是水務及動力公司派來的人一樣。芭特·白蘭遜帶了兩個手提箱，其中一個裝滿了波特阿瑟市的紀念鍵章，一些德克薩斯州的小旗，以及德士古公司送給客戶的小豬形儲蓄箱；另一個手提箱裏，裝滿了化粧品。

我們登上飛機。鍾、南茜和卡貝兒，在一個隔艙裏，和她們那重達二千磅的攝影器材擠在一起。克羅迪婭坐着，把攝影機放在膝上，出神地咬着手指甲。羅莎在看一本小說。嘉蓮暈飛機，不久睡着了。芭特寫明信片寄給她的丈夫，又和兩個水兵說笑。尤妮達坐在芭特旁邊，開芭特的玩笑。瑪嘉烈和兩個水兵談笑風生，她要他們忘掉他們在美國南部的女朋友——不論她們甚麼種族，甚麼膚色，甚麼信仰——而向她試身手，因爲她比她們任何一個都更有經驗。

當我們似非而是地西飛，向着遠東飛行的時候，美國在我們背後消失了。天堂般的檀香山，曾經是一場軍事上的災難的關島，非常遼闊的太平洋，在我們腳下過去了。

我們開始了一項旅程。這旅程長達幾千英里。我們一道去的地方，比我們夢想的任何地方都

更陌生。我希望，這次旅行是所有旅行中最好的一次——一次使我們畢生難忘的旅行。

這是一次進入內部的旅行，那沒有錯，但它不是我原來的期望，它遠遠超過了我原來的期望。

二

在香港，除了我自己之外，每一個成員都對遠東的景象感到驚異。她們在各個市場中逛了一個整天，呼吸東方的氣息，像我在十五年前那樣，懷着緊張和熱烈的心情，擁抱這個另有一種情調的城市。這個城市的污穢和嘈雜聲，她們顯然沒有注意。她們不能夠認識本質的惡化。她們沒有見過舊日的香港，她們對過去的情形一無所知。這一天晚上，我有一種奇異想法，不知道究竟是香港變了，抑或是我自己變了，抑或香港和我自己都變了。我所以這樣想，也許是因為我在比較年青的時候，在世界各地漫遊，關心自己和自己的事業，多於關心所看到的東西。也許是因為，香港從來就是一個聲音嘈雜的、人口過多的、污穢的都市。

代表團的其他成員，購買了許多品質優美的絲綢衣服和手工精良的工藝品。嘉蓮在遠東的第一站，就把她的全部禮物買齊了。芭特喜愛雕刻的佛像。她說她掛念着女兒，但是不想把這一天剩下來時間，全部用來照顧嘉蘭。尤妮達也產生了思鄉病，她讓手錶保持着密西西比州的時

間。

克羅迪婭和攝影小組的其他工作人員，開始了攝影工作。紅燈一亮，她們就開始行動。

我們各人，在港內一艘叫「萬福」的遊艇上吃午膳。

「這是一個夢，」尤妮達說：「我，一個來自密西西比州種植園的人，現在真是在中國海上航行嗎？」

我們每個都大笑起來。我產生了一種奇異感覺。在我們回到碼頭上的時候，我們各自散開，有人留在碼頭上，找一處私人地方享受陽光，有人在碼頭附近縱橫交錯的小巷裏散步瀏覽。這羣和我在一起的婦女，已經離開了她們自己的熟悉的世界。明天，我亦將離開一個自己熟悉的世界。我向前去，看見尤妮達從手提袋裏取出一條頭巾來，蓋住頭髮。她的假髮被風吹走了。我笑了一笑，又躺下來，合上眼睛。早上，我覺得我要回家了，回到我從來沒有到過的地方去。

九龍火車站上，一片混亂、喧鬧狀態，有許多旅客和新聞記者，地上堆滿了行李。看來，大部份行李是我們的：二千磅的攝影器材，裝在許多箱子裏，還有十五個手提箱，堆成小山丘。中國旅行社的代表人員，雖然很有禮貌地抑制着自己，沒有說甚麼話，却顯然被我們這麼多的行李嚇呆了。香港的新聞記者，其中大部份是中國人，在我們高聲向他們道歉，以及在火車上向他們揮手告別之後，還是向我們窮追不捨。

火車開始徐徐移動。我們終於出發了。我們由深圳進入中國。一個半鐘頭之後，我們到達了

邊境。我們站在英界，向鐵路橋望過去。許多外國人，正在走過橋來。他們當中許多人，是剛剛到廣州參加交易會回來的客人。當時，廣州交易會正在舉行。我們突然發現自己，置身於西方人的漩渦之中。這時，中國人正在或推或拿，替我們搬運行李，其中有箱子、包裹、攝影機、禮物、帽子和護照。中國工人用竹竿把一個個手提箱串起來，拿進英國海關的小屋子去。我這時看得很清楚了，我們無法記住我們有多少件行李。我們除了信賴之外，沒有別的辦法。

英國海關人員態度友好，工作效率高。沒有用很多時間，我們便檢查完畢。這時，過邊界的橋，離我們只有二十步之遙。克羅迪婭和鍾跑到前面去，拍攝我們過橋的鏡頭。我們從這裏，踏進學校課室裏地圖上所繪的空間，踏進新一代人成長的國度，踏進那使旅行家在「卡拉哥羅姆大沙漠」中失去自己的區域，踏進「人的命運」之境，以及那個擁有明陵和宏偉的萬里長城的國度。四月二十日上午十一時半之後幾分鐘，我踏進了那個使我大部份成年人生活感到煩惱的神秘之域。

周圍的一切，立刻改變了。在橋的另一邊的中國海關，頭上戴着有紅星的帽子，身穿有繡紋的綠色制服的紅軍人員，檢查我們的護照。他們背後的牆上，有一張用英文寫的標語，上面寫着：「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。」

在這裏，香港市場上那種狂亂的、震耳欲聾的喧鬧聲聽不到了。這裏是一片寧靜的氣氛。人們低聲說話。生長在鐵路兩旁的大樹，長滿了巨大的葉子，在風中沙沙地響。這裏使人產生一種